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 期 (第 13 卷)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2 2014 (Vol. 13)

社会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

包先康[1,2]

(1.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 安徽大学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人的意识的变化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积极建构的过程,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特征。改革开放前,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的传统意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小农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难以形成或被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民的意识才真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农民意识呈现出"碎片化"。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加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 民族意识; 农民意识; 公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 D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202(2014)02 - 0126 - 07

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起点可以上溯到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此为起点,可以把中国的社会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1840—1949,1949—1978,1978 至今,在前两个阶段的社会转型中,虽然农民中出现了非传统的意识,但农民意识变化并不很明显,农民的现代意识并没有很好地发育。农民意识的剧烈变化是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发生的。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近代非农意识的形成

1840 年鸦片战争致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长期的风雨飘摇的混乱时期,虽然在外界的压力之下,中国步履蹒跚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但由于外在力量的箝制和内在的制度束缚,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农民在历经磨难中也发展出不同于传统的农民意识,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农民的民族意识经历了由萌生到觉醒的变化,阶级意识经历了由无到有的转变。

(一)农民民族意识由萌生到觉醒

民族意识一词,为孙中山最早提出,其后渐为人们所普遍地接受和使用。而在我国,梁启超先生才是给民族意识作出明确界定的第一人。他指出:"何谓民族意识? 谓对他而自觉为我。"[1] 显然,这里给出的是一种民族分界意识的含义。费孝通先生却认为,民族意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2]。熊锡元教授也认为:"民族意识的含义无疑又都包括在'共同心理素质'这个大概念之中。"[3] 这些观点,显然是从民族认同的心理学角度来界说的。金炳镐先生在总结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是对应的客观存在,皆是民族意识的一部分,民族认同和民族分界实际上又是同时完成的,即是在同一认识机制中完成的,所以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即是民族意识[4]。概括地说,所谓民族意识是指在特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与它民族的互动中所形成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民族分界意识以及我民族与他民族

收稿日期: 2014 - 03 - 01

基金项目: 安徽省软科学项目(1402052042)

作者简介: 包先康(1964—),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社会政策。E-mail:baoxiankang@163.com

关系的认识倾向。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勤劳和智慧的先民们凭籍自己的努力,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并在全面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意识和凝重的民族精神。由于中华民族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实体性存在,中华民族与他民族的相互关系也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处于不断地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鸦片战争前,由于长期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中心观念,中国人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而民族分界意识比较薄弱,也就很难形成正确的本民族与他民族关系的正确认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国人才意识到自己仅是"众国之一",自己不仅不比其他国家高明,反而在很多地方还不如其他国家。在历经西方列强血与火涤荡之后,古老的华夏中心论梦碎,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民族"开始有了新的自我认知,并逐渐产生了近代"民族"意识雏形,直到了抗日战中爆发后,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才真正全面觉醒。

在民族意识的诸研究中,学界要么从国家层面探讨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要么从精英层面研究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农民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横行,农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面对外族的入侵,农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萌生。"三元里抗英"为中国农民反击外敌入侵打响了第一枪,后来,影响深远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运动。处于中国底层的农民面对主权和领土不断沦丧,自身生活每况愈下,朦胧地感受到他们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直觉告诉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初步唤起了他们的民族自卫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5]。自此,在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被不断的强化,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被彻底唤醒,并且成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力量。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一场全民族广泛动员和参与,并最终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可以说,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农民是中国最为深厚的抗日力量,没有农民的合作与广泛参与,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6]。农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在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通过积极的引导可以激发出农民极大的爱国热情,如果引导不当或缺乏有效的引导也可能演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国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既可以看作农民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具有积极意义,但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后期也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的苗头。在任何时期极端民族主义,都是十分有害的。

(二)农民阶级意识有无到有

如果说,近代农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农民阶级意识的出现,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阶级和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不平等的基本概念工具,然而,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农民的头脑中自始至终就没有"阶级"、"剥削"等革命意识形态的概念。因为,在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中,他们有着更多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乡情,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贫与富是天经地义的。在此社会结构中,他们感受不到"地主"剥削了他们,在大多数农民看来,地主的富裕是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结果,土地越多、财产越大的人"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7],并且将他们视为学习的榜样。他们"根本不知道阶级剥削;不知道社会是谁创造的,不知自己终日劳动是给地主阶级而干的,而认为是给自己干的"[8]。在此背景下,农民的阶级意识只能通过外力去建构,而无法通过既有的社会结构让他们慢慢去体悟。因此,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一个较长的时期,为了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并长期持有这种阶级意识,中共一方面采取政策宣传,通过讲革命道理的方式来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倒苦水"、"空肚子"、"算账"等行之有效的感受式教育的方法去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从而在贫穷农民中逐步确立了清晰的剥削与被剥削的意识,于是乎,"阶级的同情心与对地主阶级的憎恨会油然而生"[9],经过不断的教育和斗争实践,农民逐渐地自觉地把自己划入被剥削者行列,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划清界限,于是农民

与地主间的对立关系得以确立。后来中共又通过建立农会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让农民认识到其利益上的一致性。通过上述策略的运用,中共逐步在农民中培育出了阶级的自我认同意识、阶级分界意识,最后培育了农民的革命意识,让他们中一部分人成为革命的力量,绝大部分人成为同情或支持革命的力量,最终为取得革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直至今日,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农民中64%的居民具有农民阶级意识,45%的人具有阶级冲突意识,2.3%的人有阶级行动意识,近30%的人尚无阶级认知,并且,较低层次的意识水平主要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越是更高层次的意识水平,实践经历的建构性作用越大。而高层次农民阶级行动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在纠纷实践中建构起来[10]。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积极建构农民的阶级意识,这是一种正确的策略,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特别是"一化三改造"之后,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仍然在农民中过度宣扬"阶级斗争",其结果,斗争斗散了人心,这是值得汲取的血的历史教训。

(三)农民朦胧的主人翁意识的形成与弱化

所谓主人翁意识是指公民在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当家作主的意识或态度。简言之,主人翁意识即当家作主的意识。过去我们在探讨主人翁意识时,主要关注的是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忽视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农民作为中国人口的多数,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理应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但是,数千年的社会专制,农民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体会或经历,总是让别人当他们的家、作他们的主,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为他们作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1]可见,农民自古就缺乏当家作主的意识,专制社会结构不可能培育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的。然而,新的国家成立之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阶级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了能使农民能够行使这一权利,必有依靠外力来建构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建构策略一样,中共主要采取两种策略:一是通过政治宣传来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其中主要的是集体主义的思想意识教育;二是通过具体的实践让农民在斗争实践中激发他们的主人感。可以说,正是这种主人翁意识的有效激发,新政权建立之初,广大的农民积极投身于国家的重建,为新政权的巩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后来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使得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只存在于政治宣传中,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刚刚才建立起来的农民的主人翁意识逐渐变得模糊,直至消失殆尽。如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如何激发农民的新的主人翁意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意识的变化

实际上,农民意识的剧烈变化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是因为:一、农村实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二、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确立;三是市场经济改革对农村的广泛渗透。在农村社会整体性变革中,农民意识既发生了正向的变化,也发生了负向的变化。

(一)农民意识的正向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意识的正向变化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农民意识在弱化,二是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在逐步觉醒。

第一,传统农民意识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民意识的弱化集中表现为小农意识的弱化和身份意识的弱化。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开始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

权,提高了生产的热情,并在生产力没有多大变化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使得土地上溢出了大量的劳动力。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用工制度的松动,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大量农民纷纷离开家园外出谋生,原来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很多农民身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日益发达的商品交换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小农意识存在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了自足知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等观念体系正在逐渐瓦解,而渐渐发展出积极求变、主动创新的精神。农民的身份意识是几千年的专制的社会结构所造就的,并被身份文化和实践所强化。新中国的成立理应逐步消解社会的身份结构,涤荡身份文化,但后来诸多的原因,以户籍制度为标志,将中国人制度性地化分为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市民和农民,而且阻隔了身份间的流动,结果强化了农民的身份意识,在那个时代农民要改变身份成为市民,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很多农民子弟看到改变自己身份的希望,现在,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子弟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了合法的市民身份,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户籍制度的作用正在被消解,户籍制度的改革逐步深化,使得相当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现在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 2 亿多人,他们正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还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局部地区的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如此等等,这些因素对农民身份意识的弱化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伴随着农民小农意识和身份意识的弱化,农民的狭隘的族群意识、乡土意识和子民意识也在逐步的弱化。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农民子民意识的弱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运动密切相关,村民自治运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民主意识的发育,它正在消解着农民的子民意识。

第二,农民现代公民意识逐步觉醒。改革开放,不仅给带来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的较大改善,而且也使得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正在逐步形成。其一,农民的主体意识已经初见端倪。农村的改革是从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了出来,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同时,农民也逐步摆脱了对集体的全面依附,独立性逐步增强。物质决定意识,农村生产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必然决定了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的变化。因而,当农村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由集体生产经营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过程时,必然伴随农民意识的变化。而家庭生产经营的相对自主性、独立性和自由灵活性等特点,决定了它在塑造农民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和自由意识,并在激发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意识、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以及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正是现代公民主体意识的的主要内容。其二,农民的市场意识正在形成。市场意识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它包括竞争意识、合作意识、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风险意识、权利意识等,这与市场经济的特征密切相关。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市场经济有别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计划经济的主体是一元的,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多元。一元主体的计划经济是不需要竞争的,因为利益主体只有一个;而多元主体的市场经济存在在激烈的竞争,因为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在市场经济中,各利益主体要获得自己独立的利益必须与其他主体展开竞争。随着整体性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广泛地向农村渗透,农民被动地卷进市场之中,他们由不适应变得慢慢适应,并在市场经济实践中渐渐的产生了竞争意识;同时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一些人意识到单凭个人和家庭的力量难以在市场中立足,走向合作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并逐步萌生出朴素的合作意识。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往往把人们从熟人社会带向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信任是自发的厚信任,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要书面契约的,有时至多是一个口头协议,但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的信任只能建立在契约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因而,市场经济有利于农民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形成。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权利经济。

市场经济的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逐利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且合法的逐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市场经济实践是锻炼农民权利意识最直接的途径。此外,市场经济还是一种风险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实践也有利于培养农民的风险意识。其三,农民的民主意识正在形成。农民的民主意识核心是政治参与意识,它具体包括:民主选举意识、民主管理意识、民主决策意识和民主监督意识。农民民主意识的形成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末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确立和实施,有学者把村民自治看作民主的试验场,它在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主动的还是动员式的,农民在政治参与中或多或少会明白国家的法律还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利,他们可以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政治权利,因而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对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以及村民自治时间的推动下,与之相适应的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正在逐步形成。

(二)农民意识的负向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意识在发生积极的正向变化的同时,也发生了负向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民的集体意识正在弱化。自古以来,中国社会虽经分分合合,但"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主流形态,也是多数中国人共同期盼。多元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由于"统一"被强调,集体意识一直是中华文化精神层面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年代,还是计划经济年代,社会的整合主要依靠的是自发形成好的或人为建构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几乎吞噬或遮蔽个人意识,"个人几乎完全在共同感情的支配之下,社会强制与禁令支配了生活的大部分。"[12]35中国农村社会是受传统影响最深刻的社会,传统社会自然形成的集体意识和人民公社时期建构的集体意识是维护农村社会整合和团结的主导的社会意识,个人生活大部分被其所左右,塑造着共同的情感,一旦某一社会成员出现了违反了法律、道德规范或损害共同利益的行为,则人人口诛笔伐,大有诛之而后快之势,当然有时这也并非出于所有成员本身的自愿,但在特定的环境下,若不如此,恐被人斥之为"思想落后"、"缺乏觉悟"。其结果:个人意识被高度压制,培养人的"虚伪"、"狡猾"和"自私或自保"等品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中国社会正在由整体性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大一统的集体意识受到挑战,社会成员的个体意识增强。在这种社会中,个体的欲望冲出了集体意识的藩篱,但现代意义的个体意识或主体意识未能在短期内形成,于是"对于违反禁令的集体反应减弱;个人可以更有弹性的解释社会强制"[12]35。这时,虚伪解开了面纱,自私暴露得淋漓尽致,狡猾表现为欺诈和不诚信。当这些遭遇新的农村社会形态建构困难时,农村社会便出现了结构性"断裂",出现了市场化背景下的农村原子化社会,维系农村秩序的集体意识也正在逐渐被瓦解。但是,任何社会的维续,离不开集体意识的"社会胶"作用的发挥。然而农村已不可能再回到传统共同体社会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他只能由原子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在个体化社会里,最主要的问题仍在于保持最低限度的集体意识,否则农村社会将会分崩离析。面对农村传统集体意识的弱化、农村社会失序,重构农村社会新的集体意识迫在眉睫,而要重构农村社会新的集体意识,既需要建构普遍性的社会规范,更要建构农村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或空间才是现代集体意识发育的温床。

其二,农民的责任意识正在弱化。长期的专制统治造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臣民意识和子民意识,集中的体现为臣民责任意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集体主义教育,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服从和义务意识。传统的责任意识和集体主义教育所形成的责任意识,激励着人们为

国家为社会做奉献。因此,中国农民为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默默奉献着,并坚守着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责任。然而,在广大的农村,自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由公社时期的“社员”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的“私人”,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小农经济结构又使农民的不完全自主意识和狭隘的利益意识明显增强,曾经的“社会人”的集体意识日趋于淡化,集体责任意识也消弥殆尽。大多数村民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与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关系,缺少对社会责任和集体责任的担当。多数的农民遇事往往只考虑个人私利,对村庄的建设、村里的公益事业十分冷漠,认为乡村建设和公益事业是国家的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是村干部们抓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对村里的公益性建设缺乏关心与热情,更不愿意通过自愿集资出义务工等方式参与村里公益事业。目前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出现了“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3]。以至于农村社会生产性集体行动变得十分困难困难,较大范围的合作互助难以展开。此外,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农民意识中所包蕴的正直、诚实、善良、勤劳、宽容和乐善好施等美德正在弱化,而一些不良的品德,如,杀熟、急功近利、恶意竞争等纷纷出现,极具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乡村权力崇拜意识在新的形势下潜藏于不同形态的现代文化形式中,并成为一种“深层现实”[14]。上述美德的恶化、恶德的彰显,以及权力崇拜意识的日益膨胀,都正在消解着农民的责任意识。

随着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弱化,再加上社会转型期社会失序和制度腐败,少部分农民一旦离开了“熟人社会”的农村来到“陌生人”社会的城市,长期的被边缘化的城市生活很容易产生新的“游民化”倾向和“游民意识”[15],并有可能成为“新游民”群体的一部分。研究表明,“新游民”群体已经成为城乡犯罪的高发群体,也是一些国际性的黑社会组织和涉黑势力网络的对象。一旦“游民”变成“暴民”, 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破坏者。因此,我们对农民意识的变化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积极引导。

三、结论与思考

总之,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引发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农民意识的变化的方向,但农民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变化往往会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实体部分。其结果是:传统的农民意识和农民公民意识并存,农民意识的正向变化和负向变化并存,农民意识正在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如果我们放任这种趋势的发展,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有可能遭受挫折。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并不意味着高楼林立、企业和公司遍布,但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让农民过上现代生活,共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同时,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主体,新农村需要新农民。而新农民不仅仅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而且还要是具有现代意识。农民意识的碎片化显然不利于农民现代意识的生成和发育,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对农民意识的变化加以积极引导,从而促进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16],造就公民式的新型农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转变的艰巨性,因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17]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而这些影响因素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3:43.

[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147-162.
[3] 熊锡元."民族意识"初析[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3):29-30.
[4] 金炳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理论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3):8-15.
[5] 沙莲香.中国社会文化心理[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19.
[6] 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农民[J].学术研究,2005,(8):108-113.
[7] [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韩 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52.
[8] 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657.
[9] 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研究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2辑)[G].内部参考教学用书,1980:259.
[10] 陆益龙.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结构抑或建构——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0,(1):114-124.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1.
[12]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8.
[14] 李兴阳.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新世纪乡土小说与中国农村变革系列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36-140.
[15] 张红显.游民意识与隐性社会稳定风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0-126.
[16] 包先康,朱士群.公民教育与新型农民培养[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19-125.
[17] 陈方南.影响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障碍及其解决途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0,(9):146-148.

Transition of Peasant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BAO Xian-kang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Problem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Consciousness transition is not only a spontaneous process but also a man-made active construction process. Transition of farmers'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is characteristic.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lthough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hav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but there have been no fundamental change, and the modern peasant citizen consciousness was difficult to form.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reform, farmers' consciousness has actually changed, which brings about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and farmers' consciousness presents "a fragmented phenomenon".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we need to cultivate farmers' civic awareness.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armers' consciousness; citizen consciousness